

“符号学研究”特辑(笔谈5篇)

双义合解的四种方式:取舍,协同,反讽,漩涡*

赵毅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双义或多义,是对任何符号文本的解释中常见的情况。一旦出现多解,它们之间必须形成一定的共存关系。意义一致,就会出现“协同解释”;双解矛盾,就会造成“反讽解释”;意义流动方向性的来回修正,可以造成“解释循环”;而在许多情况下,关于同一事物的同一个解释,可以设法修正两个不同的认知差,这两个解释很可能互相不能取消,由此形成“解释漩涡”。解释的不稳定,是解释丰富性的源头;而解释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意识要求填补认知差的意向性。

关键词: 双义;协同;反讽;解释漩涡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81(2017)04-0117-07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7.04.022

1. 解释取舍

在同一解释主体的同一次解释中,出现两个解释,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原因可以多种多样:文本号称为一个统一整体,这只不过是一种有机论神话,它们的意义合一是解释的结果,但却是无法保证的结果。文本的各部分会引发不同的解释,尤其当我们引入“全文本”^{[1]148}、“宏文本”^{[2]55}观念,把文本看成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例如文本与标题等副文本结合,例如文本与前后文本结合)。甚至对表面上结构紧密意义清晰的文本,也有双解,例如其历史意义与当下意义有所不同,例如不同的参照系和语境造成意义不同。实际上,在任何问题上,单义的解释是很少遇到的,双义甚至多义,是解释者必须面对的常态。本文只讨论双义,因为多义的解释,可以根据这些模式化解成一系列双义关系来处理。

正常双义的辩义,是选择一种解释,用此解释取消另外可能的解释。例如忠言逆耳,在辩义之后,相信这是忠言而采纳之,逆耳之义就被忽视;当然,只

听到逆耳之义,拒绝忠言,也是经常发生的事。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衣服既可以正着穿,也可以反着穿,即没有“里”“外”之分。正着穿时的“里”恰好是反着穿时的“外”,正着穿时的“外”恰好是反着穿时的“里”,因此当我们在看到这件衣服的一面时,这一面到底是“里”还是“外”?在同一主体的同一次解释中,完全不会有误解:穿在外的一面,取消在里一面的“面子”资格。如果脱下反过来另穿,那就是另一个文本引发的另一个解释。取舍选一比较简单,是我们遇到双义(或多义)文本后必须做的,也是自然而然会做的第一种方式。

甚至我们不能完全确定的解释,例如《三国志》中曹操对赤壁之战的解释“曹公与孙权书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3]342}而同一书中另外有记载“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近,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3]320}我们无法否定这两种说法那一种对,周瑜究竟有没有“大破曹军”,但是也没有证据说曹操的

* 收稿日期:2017-01-19

作者简介:赵毅衡(1943—),男,广西桂林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符号学、叙述学、意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项目编号:13&ZD123)成果之一。

话完全是向壁虚构,因此一般历史书都说曹操赤壁大败,另一说只能存疑作参考。但存疑留待进一步证据,本身即是取舍,即暂且只承认一说,哪怕证据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我们对待绝大部分暂时多义无法取舍的问题,都用这种态度。

2. 协同解释

本文着重讨论谈双义或多义必然(而不是暂时)无法靠辩义取舍的情况,亦即解释时双义不得不并存的局面,这种多义来自文本本身,并非解释者缺少证据暂时无法取舍。此时解释者的处理方式共有三种:协同、反讽、漩涡。

最简单的情况是协同解释: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解释,方向相同,此时解释协同,双义都保留在解释中,因为它们产生合一意义。此类的多义,方向是一致的,互相协同。尤其是科学的/实用的符号表意,文本的几个部分,或参与文本解释的伴随文本组成的整体,意义方向必须一致。不然会弄出混乱,这就是为什么药名不对货物,名称追求多于花哨,说明书与品牌不符,会引出误会,导致纠纷。

而文化的,文艺的文本,表意方式大多也是多义协同的。例如电影的音-画协同;美术的图像-文字说明;在游戏中,几个媒介是同向的:你控制的枪开火时,有火光,有爆炸声,对面敌人图像倒下,几个媒介意义相辅相成;在报纸上,新闻内容、照片、刊登版面(头版头条社论,或文艺副刊)是一致的;标题与文本的意义一般是一致的,例如《白夜》这标题,可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写一个幻想者朦胧的恋爱;是贾平凹中篇,阴阳界人鬼难分;是韩国同志电影,长夜暧昧不明;也是成都的一家酒吧,希望顾客享用永昼。所有这些文本,标题或是增添气氛加入情调,或是点明主题,都是协同解释。

协同意义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歧义。《白夜》这个标题可以有风土人情意义(例如北欧风光),气象学意义(例如寒冷地区的暖夏),或是北地寒冷难得的间歇,也可以有精神恍惚的联想。但是结合整个文本,不难猜出哪个意义部分协同文本解释。协同的双解疏导传达,使传达变得简易清晰。

如果几种意义中,有一种语义特别清楚,由于意义的一致化要求,这种意义就成为文本其他部分不得不跟从的意义。当几种意义都模糊不清,解释者就会从最清晰的部分寻找解读的凭据。一般来说,哪个意义有主导性,是由体裁的程式决定的。

在电影的多媒介竞争中,“定调媒介”一般是镜头画面,因为画面连绵不断,而语言、音乐、声响等时

常中断。一旦人物说的语言与人物表情画面意义正好相反时,画面意义应当是“定调”的。杨德昌的《一一》中,镜头的声音是中年男子和女友的谈话,画面则是他们的下一代街头约会的场面,音与画各讲一个故事,显然镜头画面主线在下一代身上,上一代的语音已成遗迹。

而在歌曲中,“定调媒介”是歌词,歌词决定歌的意义解释。《社会主义好》无论用什么风格来唱,都是颂歌,但是电影《盲井》中人物唱卡拉OK时把词改了,就变成讽刺歌曲。经常,交响乐不得不靠标题决定意义。有的乐曲意义似乎清晰,如德彪西《大海》,霍尔斯特交响诗《行星》,甚至如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有捷克民歌,柴可夫斯基的《1918序曲》用了《马赛曲》,乐曲依然必须靠标题才让人听懂。现代抽象艺术由于画面意义不明确,不得不有标题决定意义,例如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滴沥画《秋天的节奏》,画面只是颜料乱飞,意义完全靠标题设置。

双义协同最常见于比喻,比喻形式无论如何变化,必然同时有喻本(vehicle)意义,与喻旨(tenor)意义并存。说“我的爱人像玫瑰”,爱人的可爱与玫瑰的魅力并存,如果改说“你是我的玫瑰”,“我梦见玫瑰”,依然需要双义合一才能得到理解。符号比喻比语言比喻更贴切,因为喻本必须可以被感知,不得不“就近取譬”。举个例子:电影《独奏者》(The Soloist),一位沦落为街头流浪汉的音乐家,得到一把大提琴,赞不绝口地说“琴弦需要松香,就像警车需要囚徒。”当他拉到一段华美乐章,警笛声融合进入音乐,警察从警车中跳下驱赶流浪汉,这就成为听觉与视觉比喻符号的双义协同。

修辞学说比喻的两造之间有“像”“如”等字称为明喻,没有则是隐喻。在符号修辞中,无法出现“像”“如”这类连接词或系词,但是符号明喻的特点是直接的强迫性连接双义,不容解释者忽视其中的比喻关系。例如许多影片公司的片头,米高梅公司的狮吼,21世纪福克斯的探照灯等,都是符号明喻。商品的图像与名称最后一定会出现,而且必然是喻旨之所在:广告中著名球星的精彩射门,最后必然拍出他穿的球鞋是什么牌子;女演员演女皇,下诏所有侍女不准用某种香水,这香水总会出现在她的御用梳妆台上,瓶子上的牌子必定用特写映出;世博会的一个广告,是身着西装的上海白领,身体的另一半是秦俑武士,世博会既是中国传统发扬光大,也是现代都市的力量展现。广告比喻的强制性连接,如系辞

“像”一样明确,协同成一个整体意义。

与明喻不同,符号隐喻的双义之间的连接比较模糊:如果解释群体能找到这个比喻点,符号的意义效果就比较好,但是没有有一个连接能保证这个关系。李安导演的《喜宴》,主人公最后出美国海关通过安检口,举起双手,这是“投降”姿势,他对已经“香蕉化”的子女毫无办法,对文化的隔代迅速变迁毫无办法。此中的双义(举手安检、对时代变化无奈),要有悟性的观众才能得出协同解释。

但是符号双义的连接,一般说比语言比喻模糊一些,因为并未直接言明。例如某部谈青少年成长的影视,片头的景色是开花的原野;再如某座桥头巨型雕塑英雄的手臂直指前行方向,或某个文化宫前广场安置一个罗丹“思想者”雕塑,某本谈宋代市民社会的书,封面是《清明上河图》。如果符号文本接收者看清了双层意义,协同依然可以达到。

转喻的意义靠的是邻接,提喻靠的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转喻多见于症状、踪迹、手势等指示性符号,而提喻多见于图像影视等。转喻在非语言符号中大量使用,甚至可以说转喻在本质上是“非语言”的:它的基本特点是“指出”,而箭头,手指的方向性(vectorality),比指示代词“这个”、“那个”更清楚更直观。许多社会现象或心理现象,是符号转喻,例如恋物狂。《红楼梦》贾宝玉爱吃胭脂,是对“邻接意义”过分热衷,此时“爱某女”与“爱某女的某个用品”双义并存但是协同。

几乎所有的图像都是提喻,新闻图片,电影图景,都只是显示给我们对象的一部分,让我们观众从经验构筑全幅图景,戏剧或电影用街头一角表示整个城市。提喻使图像简洁优美、幽默隽永,言简意赅。钱锺书用绘画为例,说明提喻的妙用《孟尝君宴客图》有人画两列长行。“陈章侯只作右边宴席,而走使行觞,意思尽趋于左;觉隔树长廊,有无数食客在。省文取意之妙,安得不下拜此公!”钱锺书评说,“省文取意,已知绘画之境”,省文取义,也即是说,文与意可以表现不同。^{[4]1136}

某些女子出门挎的名牌提包,是财富的提喻,“高贵”提包的表意作用,在于提包生产商在成功地花大血本做了广告后,故意售价很贵。于是牌子提喻财富。欲望指向无法满足的东西,其意义与所有的符号意义一样,必须不在场。符号转喻永远不可能代替希望的本意意义。因此,人们用名牌,来代替欲望。我们在解释中双义协同合一。

绝大部分宗教都认为人生最好的归宿是升天,

天堂在上。但佛教却认为极乐世界在西。《观无量寿佛经》中第一观就是“日观”,以观悬鼓落日为方便。追寻人生根本意义的人,日落西山,即是在无意义的时间轮回中,标出了有限与无限的转换,因此落日之处为轮回之处。落日之义,加轮回之义,方位概念的双义,比喻了根本的宇宙观。

协同解释的最复杂情况,是解释循环。因为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本文篇幅有限,不准备深入,只限于指出:解释循环是双解互相加强,是协同解释的一种方式。解释循环在20世纪阐释学诸家手中发展到5种之多(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两种循环:部分与整体,属类与作品;伽达玛提出历史语境与当下语境;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与理解;利科提出第五种:信仰与理解)。^{[5]22}伽达玛指出,诠释循环不是“恶性循环”:“理解既非纯主观,又非纯客观,而是传统的运动与解释者的运动之间的互动。对意指的预期决定了对文本的理解,这不是主体性的行为,而是由把我们与传统连接起来的社群决定的。”^{[6]67}在解释循环中,两种解释(例如历史解释与当代解释)协同取得一个“视界融合”;文化的历史意义积累,在解释循环中取得更深刻的协同理解。

3. 反讽解释

追求一个确凿的意义,是解释者的常规需要,因此,下面讨论的两种是双义矛盾时,求一“合解”方法,即反讽与漩涡,二者都是无法得到稳定单解时,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些方式是解释的非正常标出项。^{[1]278}

反讽(irony)是处理双义解释的一种“不同而和”的方式:当双义之间有矛盾对立,我们采用一个意义,擦抹另一个意义,但并不完全取消另一种意义,而是将另一义留作背景。反讽解释处理两层相反的意思:字面义/实际义;表达面/意图面;外延义/内涵义。两者对立而并存,其中之一是主要义,另一义是衬托义。此种文本“似是而非”,“言是而非”,但是这二者究竟如何安排主次,却依解释而变化。反讽不同于各种比喻:比喻也有双义,也有一主一辅,但却属于协同解释,符号意义异同涵接,各种比喻都是让对象靠近,然后一者可以覆盖另一者。而反讽却是不相容的意义被放在一个文本,双义排斥冲突,却在相反中取相成,欲擒故纵,欲迎先拒。反讽的魅力在于借取双义解释之间的张力,求得超越传达表面意义的效果,无怪乎反讽最常见于哲学和艺术。

中西哲人早已发现反讽是一种强有力的表意方

式:道家、名家、墨家著作充满了反讽,苏格拉底的反讽成了西方思想方式的源头。反讽在当代扩展为根本方式,成为表意方式的本质特征。反讽不是讽刺,也不是滑稽,虽然很可能带着这些意味,大部分反讽并不滑稽,只有某些类型的反讽可能带着讽刺意味,两者并不同义。《史记·樗里子传》“滑稽多智”。注曰“滑,乱也。稽,同也。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乱同异也。”司马迁用“乱同异”来定义,说明汉初的“滑稽”实际上是反讽。

比喻的各种变体,立足于符号表达双义的连接,反讽却是符号对象的冲突;各种修辞格是让双义靠近,而反讽是两个完全不相容的意义被放在一个表达方式中;因此反讽充满了表达与解释之间的张力。母亲说贪玩的孩子:“奇怪了,你怎么还认识回家的路?”这是恼怒的感情表达,比责骂更为有力,并不好笑。

最宽的反讽定义是由新批评派提出的,他们认为文学艺术的语言永远是反讽语言,任何“非直接表达”都是反讽。布鲁克斯说“诗人必须考虑的不仅是经验的复杂性,而且还有语言之难以控制,它必须永远依靠言外之意和旁敲侧击。”^{[7]674}弗莱也认为在语境的压力下,文学语言多多少少是“所言非所指”,诗中的文词意义多多少少被语境的压力所扭曲。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反讽:反讽是“口是心非”,冲突的意义发生于不同层次:文本说是,实际意义说非;而悖论是“似是而非”,文本表达层就列出两个互相冲突的意思,矛盾双方都显现于文本。哲学中常用悖论“道可道非常道”或“沉默比真理响亮”;日常用语也可能常用悖论,例如说“我越想他,我越不想他”,表面上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是说“他能让我想到的只有坏事”。在文本层次上,悖论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超越文本的解释中才能合一,“想他”这个意义实际上被压倒了。

电影中经常出现各媒介的意义冲突,《斯大林格勒战役》结尾,两个德军俘虏在西伯利亚大风雪中举步维艰,一个说“冬天的唯一好处是让人没有感觉。”另一个说,“你会讨厌沙漠,在那里你会像牛油一样烤化。”这个例子具有反讽的超强力度,远远胜过任何直接的宣称“侵略者决没有下场。”其意义(在大风雪中的德国俘虏庆幸没有去非洲,到底是不是真话)在表面上并没有定论,观众都知道俄国严寒的威力,以及德国战俘的冻死比例,不会弄错意思。文本的两个部分各有相反的意指对象,必须

在一个适当的解释中统一起来,只是悖论的解释不会完全取消另一义。庆幸“没去北非不至于晒坏”,让他们的下场更为悲惨。

你什么工作没有做好,上司说“放心,我这个人不容易生气”,这可能是安慰,也可能是威胁。安慰与威胁两个解读不可能并存,表面义与真实义不合,有效的解释能够依靠各种伴随因素(例如语境,例如此人脾气)帮助,读出有效的意义。但是,解释者只能采用其中一义,因为只有一义具有真值,另一义是陪衬(让上司的话变得更为危险)。

再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八分赛,于洋/王晓丽组合有意打输,因为先后赛事不赢可以获利,裁判判定二人“消极比赛”,取消比赛资格。对于他们打球的拙劣表现,必须去双读:比赛要求赢,赛程要求输。但是一个不能盖过另一个,两个意思都应当说得通,比赛场面至少要过得去,他们却把这个微妙的双义反讽弄成单义了。

无论是悖论或反讽,都是一种曲折表达,有歧解的危险,因此不能用于要求表义准确的科学/实用场合。还是用天气作例子:如果电视台气象报告天气很好,打出的图像却是乌云暴雨,电视观众就会认为电视台出错:在科学/实用传达中出现自我矛盾,接收者只能拒绝接受,等待澄清。

在当代文化中,一语二义的双关语大量使用于广告与招牌,它们明显有两个渠道同时表意:商品展示,是主渠道,广告意义最后要聚集到商品本身。正由于如此,文本可以充分拉开距离,商品展示必然把意义“矫正”到广告制作者意图中的位置。由于这个意义保证,广告的名与实距离拉开越远,实物能指需要矫正距离越大,广告就越是发人深思,给人印象越深刻。使用“相关不恰当”,广告反说,而商品正读。反讽加强了广告的“注意价值”与“记忆价值”,^{[8]1702-21}我们可以称之为广告与招牌取名的“远距张力”品格。

以退为进的“自谦”广告有时候可以起到很好的效应。“低调陈述”不是真正的自我贬低,而是退一步加强效果。但是最有力的反讽广告,往往与自谦结合,此时需要定力和胆量,不怕误会。例如汽车广告可以承认有噪音“在时速60英里时,劳斯莱斯轿车最大的噪音来自车上的电子钟。”邦迪广告,形象是克林顿与希拉里执手起舞,闪电裂痕出现在两人之间,此时出现广告语“有时邦迪也爱莫能助”。最大胆的可能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廉价旅馆,标榜“世界最差”:“酒店四十年来一直以让旅

客大失所望而自豪。酒店为其舒适度可与低度设防监狱相媲美而无比骄傲……免责声明: 入住期间, 如不幸发生食物中毒、精神崩溃、罹患绝症、肢体残缺、辐射中毒、感染与 18 世纪瘟疫相关的某种疾病, 本酒店概不负责。”这种带有自嘲的幽默, 吸引各地的好奇之士去一探究竟。当代的广告与招牌大量使用反讽, 是这个社会急剧演变的征兆: 竞争激烈急需增加消费, 才会千方百计用反讽来吸引注意。

文学作品经常利用情景反讽构成情节: 屡考不中的范进, 最后已经不想考, 马马虎虎敷衍交卷, 却中了举。一般把这种场景称作“命运的捉弄”, 双重的捉弄就成了加倍的反讽。《始皇本纪》方士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因大发兵北击胡, 不知其指宫中膝下之胡亥。^{[4]442-443}

当一个文化中的符号意义出现反讽暴增, 是当代的局面。文化早期, 商鞅以刑法治秦, 最后自己死于车裂; 周兴喜用酷刑, 最后被“请君入瓮”, 都是偶尔见到的例子。人类文化大局面, 见到反讽的各种变体。此时反讽超出个别表意, 进入了对历史的理解。情景反讽是意图与结果之间出现意义反差, 而且恰恰到达了意图的反面。你给领导送去珍贵礼物, 结果他因腐败劣迹倒台, 你的事也办不成; 当每个人都只相信熟人好办事, 整个社会结构进入板结状态。

“历史反讽”(historical irony), 与情景反讽相似, 只是规模巨大, 只有在历史规模上才能理解。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赛和约力求让德国永不翻身, 结果引发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例如抗生素提高了人类对抗病毒的能力, 结果引发病毒变异。如此大范围的历史反讽, 有时被称为“世界性反讽”(cosmic irony)。可能有人认为, 大规模的人类行为, 不是符号文本, 然而反讽揭示出行为的意义本质。应当说这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大特征: 人类自以为聪明, 从长远看大半事与愿违, 许多人为的预测: 发明塑料引发大规模白色垃圾; 追求 GDP 引出污染与全球变暖; 发明原子能弄得核武器无法控制。

反讽是思想复杂性的表现, 是对意义简单化的嘲弄。德国诗人许莱格尔认为“哲学是反讽的真正故乡”; 克尔凯格尔声称“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 一种真正的, 名副其实的生活起始于反讽”,^{[9]2} 他在一个多世纪前就预示了反讽的“人性本质”。在文艺学方面, 新批评派对反讽高度重视, 韦恩·布斯在“反讽帝国”一文中提出“反讽本身就在事物当中, 而不只在我们的看法当中”。林达·赫琴宣称“在

后现代主义这里, 反讽处于支配地位。”^{[10]67} 德曼认为反讽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11]8} 他认为反讽可以有三种理解: “文学手法”、“自我辩证”(dialectic of self)、“历史辩证法”(dialectics of history)。^{[12]170} 这样, 反讽从符号解释方式, 演化成当代文化的基本形态。

4. 解释漩涡

在同一个主体的同一次解释中, 文本出现互相冲突的意义, 它们无法协同参与解释, 又无法以一者为主另一个意义臣服形成反讽, 此时它们就会形成一个解释漩涡。此时文本元语言(例如诗句的文字风格)与语境元语言(此文本的文学史地位), 主观元语言(解释者的文学修养)直接冲突, 使解释无所适从。

而在同一主体的同义词解释中, 两个不同的意义冲突, 没有一方被排除, 此时造成的“解释漩涡”: 互不退让的解释同时起作用, 两种意义同样有效, 永远无法确定。这种情况非常多, 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解释活动的一个重大特点, 注意观察, 就会发现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然现象。但是解释漩涡问题却至今没有人提出过, 虽然个别例子一直是有人提出过的, 但是至今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解, 更不用说得到学理上的充分研究。

“特(忒)修斯之船”悖论, 是公元 1 世纪的时候拉丁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提出的一个难题: 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 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 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进一步推论: 如果有人用忒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 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 在任何一个实体, 无论是公司、球队、大学, 无论是器具、个体、品牌, 我们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同一性究竟是存在实体中? 还是在名称中得到延续? 实际上这是一个符号身份的漩涡。

最常见的解释漩涡, 出现在戏剧电影等表演艺术中: 历史人物有一张熟悉的明星脸, 秦始皇长得像陈道明, 为什么并不妨碍观众替古人担忧、气愤、感动? 因为我们解读演出的元语言漩涡, 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程式, 成为惯例。哪怕观众对演出的解释, 一直在演出(演技等)与被演出(故事情节等)之间滑动, 观众对此双解不会有困惑。对于名演员过去演出的记忆, 会影响演出的场景的“真实感”, 此种意义回旋是演出解释的常规。解释漩涡并不总是对解释起干扰破坏作用: 哪怕历史人物有一张名演员

脸,没有人会觉得演出失真不可信。

表现与被表现的含混,文本与解释之间的含混,正是表演艺术的魅力所在。中国戏曲演出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剧中女主人公由于某事引起的悲伤开始呜咽拭泪,而就在你知道了她万分悲伤的当儿,她的呜咽已转入哭腔,越拖越长,越哼越响,终于在观众席里引起一片掌声与喝采声。对于被剧中“孝女”或“贤妻”的真情打动的观众会产生同情怜悯之感,甚至潸然泪下;同时他们可以注意文本形式美,会满意地欣赏演唱技巧,形成了令人深思的解释漩涡。这个原则可以扩大到所有的艺术:符号表意的踪迹(例如演出的“假”、小说的“虚构”、绘画的平面)指明了与表现对象的距离。这是因为形式与内容(演出与被演出)本质上处于两个不同层次,但是在接受这一头,双义并不互相取消,而是综合为一个漩涡。

解释漩涡,是笔者6年前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①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1]268}解释漩涡实际上是随时可见的解释方式,是人类意义行为的常态。之所以至今没有人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反讽解释,实际上解释漩涡与其他双义解释,包括反讽解释,有根本性的不同。

双义的解释,最简单的事取舍,只允许一义;欲保留双义,第一种是协同解释,两个解释意义方向一致,并无矛盾,无须取舍。这是本文说的双义合解的第二种情况;本文讨论的第三种双义合解,反讽和悖论,双义并存于解释中,但是一个意义压倒另一个意义,一个是正解,另一个副解作为陪衬。这些都与解释漩涡这第四种方式很不相同。

而解释漩涡与以上几种“合解”完全不同。白居易《卖炭翁》一诗,说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一方面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另一方面又担忧炭不好卖,把希望寄托在寒冷的天气上。我们无法说他心里哪个是正解,哪个是陪衬,卖炭翁对寒冬的矛盾心理产生了解释漩涡。

解释漩涡是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核心价值观。曹禺的《原野》中,焦阎王害了仇虎一家,而当仇虎前来寻仇时,却发现焦阎王已死,只剩下他懦弱无辜的儿子焦大星。一方面,仇虎与焦阎王有“杀父之仇”;另一方面,仇虎与焦大星从小一起长大,是“干兄弟”,又有“兄弟之情”。《原野》一剧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种解释漩涡让观众对角色的同情心处于漩

涡之中。

而对于真实的历史人物,解释漩涡就更多。李世民在公元626年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了自己的长兄和四弟。理想帝王和霸权帝王落在同一解释之中,就出现了评价李世民无法摆脱的解释漩涡。西汉时,辕固生与黄生在景帝前争论“汤武非授命”。儒家认为暴力推翻暴君是具有合法性的,道家则不予认同。对于汤武革命的合法性,景帝既不能否定也不能肯定。汉景帝的结论是一个解释漩涡比喻“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13]276}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自述他在童年时就喜欢讲故事“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人什么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母亲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这是母亲对儿子的意义漩涡。实际上我们对任何自己关心的人,都会有类似意义漩涡。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女主人公是大龄剩女,其母非常着急,但是又想要女儿找一个高富帅。她不待见女儿现在的追求者,认为他穷、不够帅。可是这个追求者又帮助女儿赶走了欺骗感情的流氓艺术家,情感上是真心的,母亲对待同一个人产生了既肯定又否定的评价漩涡。

南非记者凯文·卡特获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照片上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首发后举世震惊,成为南非儿童苦难的一个标本。有人认为凯文·卡特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称他见死不救,而有的人认为他只是以新闻专业者的角度履行记者的专业精神。凯文·卡特自己也陷于苦恼的解释漩涡中,最后,用尾气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再比如安乐死这个老问题,德国媒体曾报道,一名德高望重的医生,因涉嫌安乐死被捕。有的人认为,从道德的角度来讲,为他人实施安乐死是人道主

① 目前此书有2011、2015两个版本。

义的一种体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法律角度讲,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生命。如果评价主体分开,不同意见形成争论。但是当评价主体合一时(例如一个社会必须取得共识时,或是死者的亲友面对这问题),就无法调和法律与道德的矛盾关系,便出现了评价漩涡。同样的例子也出现于中国人所谓“白喜事”,即八九十高龄者去世,亲友来悼念,却要宴席一场,送老友高寿离世;儒家伦理难以避免“忠孝不能两全”,我们平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都是这种例子。

甚至在学术上,也有不少解释漩涡。符号学界对认知学的态度,有些人认为认知符号学应当坚守人文阵地,有的人认为应当朝神经科学靠拢,最后大多数人认为认知符号学既是人文又是科学。^{[14]125}再例如传播学中认为“噪音”是文本信息之外的多余因素,应当可以排除,但是真正清除了噪音的艺术文本(例如某些音乐),就缺乏文化与社会的厚重回响,艺术性被破坏。^{[15]181}

而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使评价漩涡的规模和影响面更加增大:对每个国家,民族利益与跨民族利益不得不同时起作用,出现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解释漩涡。在这种时候,不善于利用解释漩涡,不善于内化冲突,就难以适应多元化的世界大潮流。谁能适应并充分利用评价漩涡,谁就在世界潮流中走在前面。

参考文献:

- [1]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胡易容. 宏文本:数字时代碎片化传播的意义整合[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5).
- [3]陈寿. 三国志·周瑜传引江表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钱锺书. 管锥编·太平广记·八八[M]. 北京:三联书店,2007.
- [5] Don Idhe,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œur[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 Press, 1971.
- [6] Robert L Dosta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dam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2.
- [7] William K Wimsatt and Cleanth Brooks, 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M]. New York, Knopf, 1957.
- [8] Luuk Lagerwerf, “Irony and Sarcasm in Advertisements: Effects of Relevant Inappropriatenes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October 2007.
- [9][丹麦]克尔凯格尔. 论反讽概念[M]. 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
- [10] Linda Hutchen, 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11] Paul de Man, “The Concept of Irony”, in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M].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 [12] Paul de Man, “The Concept of Irony”, in Aesthetic Ideology [M].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13]班固. 汉书·轲固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4]胡易容. 从人文到科学:认知符号学的立场[J]. 符号与传媒, 2015(11).
- [15]何一杰. 噪音法则:皮尔斯现象学视域下的符号噪音研究[J]. 符号与传媒, 2016(13).

责任编辑:万莲姣

Four Ways to Resolve Double Interpretations: Selection, Coordination, Irony and Vortex

ZHAO Yi – 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Double meaning occurs frequently. Once it appears, there must be a way of reconciliation. When the two are in agreement, they form a coordinated interpretation. When in contradiction, they form an ironic interpretation. Once the interpretation goes round between, it becomes a hermeneutical circle; But there are also occasions that the two co-exist and supplement each other but do not merge into one, thus forming an “interpretative vortex”. Its instability is the source of the richness of meaning, as it fills a number of cognition gaps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double meaning, coordination, irony, interpretative vortex